

75  
1945-2020

#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十)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因，是讲课存有硬伤，内容老套，缺乏新意，不免令人乏味。深层次原因是学识功力薄弱，没有能掌握必要的第一手材料，而这很大程度上又缘于治学工具——英语没有过关。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实施改革开放方针掀起的学习英语和新知识热潮中，北大工会乘势为教职员举办英语业余夜校，大家纷纷踊跃报名，课堂上多为面熟的年届三、四十岁的同事。我们年近中年，更觉时间的急迫和珍贵。那时真有一种拼搏精神，将学好英语视为人生又一个拼搏，力争博得成功，让自身的业务能力更上一层楼，在工作上开辟新天地。我怀着这种愿景，设法妥善安排好担负的工作任务和家务琐事，尽可能挤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上好英语夜校，“废寝忘食”地“恶补”，“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那段时间，似乎成了我为英语过关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这和我在反右派斗争时期陷于思想苦闷，深受煎熬的“日日夜夜”是绝然不同的精神状态。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从英语几近荒疏的基础上起步，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连续通过了中级班到口语班的课程，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

1980年临近学习结业，我在教研室的支持下，马不停蹄又报考了由当时中国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合作创办的“北京经济英语培



（右图为：赖荣源(右一)在椰加达观影时于电影广告的新事物和新观点，拓宽观察和思考问前和堂姐及同学合影）

训中心”。通过严格考试，我终于如愿被录取为该培训中心的首批学员。该培训中心实施初、中、高三级阶梯式循序渐进的教程，各级教程均设有语言、文化和工商管理三大课程板块，多元课堂教学和课下自修兼顾，听、说、读、写四会贯穿始终。在美方多位外教标准地道的美式教授方式的熏陶下，我们得以不出国门也可以亲身体验到“留学”的学习效应和成果，专业英语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明显提高。人近中年我总算赶上“学识补课”的“加班车”，为今后自己专业课程教学以及其他相关工作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俗话说“机遇会降临有准备的人”，这似乎在我身上得到应验。1981年我完成培训中心的学习任务回到学校时，当时教研室负责人（当时主任洪君彦老师赴美做访问学者，由党支部书记张康琴老师代理）突然找我谈话，商量我是否能“乘热打铁”为经济系开设经济

专业英语课。她告诉我原来负责试教这门课程的外请教师因教学效果不佳已被辞退，转而拟请本系一位懂英语的厉老师讲这门课，无奈这位老师表示他“自学成才”的英语是“哑巴”和“聋子”英语，只会阅读不会听和说，难以胜任。康老师强调现在这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实在难以物色到适合的人选，陷入师资短缺的窘迫境地，面临无法开课的“危机”；而我原来准备的课程“资本主义货币和银行”，则较易找人替代。开设经济专业英语课的教学任务使我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我深刻认识到，为了贯彻“教育要面向四个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培养业务过硬的合格涉外专业人才，北大需要吸取以往英语教学和实际应用相脱节的经验教训，开设经济专业英语课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担任这门课程，就意味着我必须改行，会丢失专业知识的“老本”，就像有

的同事曾描绘的那样，任教专业英语基础课最终可能会“沦为”某种讲“简单重复”基础课程的“教书匠”，今后可能会对自己的业务发展和专业职称晋升不利；何况根据以往的老传统看法，外语工具课往往被视为辅助专业主要课程而设的边缘课程，而且讲课的老师似乎往往也是因有某种问题受过处理没有被重用的边缘人员。可能出于这种缘由，有的同事要我审慎考虑好才作决断，连洪君彦主任回国后得知我已改行也曾表示过惋惜。不过，当时我从大局出发，经过认真的全面考虑与权衡利弊，清楚认识到这门不可或缺的专业英语课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因为“无人能上”的“危机”情况而断然被取消，现在领导正式提出要我担当，而我又是一位受过英语培训中心专业教育的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技能，理应出面担当现实迫切需要的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正是在这个思想认识的指导下，我遵从领导的有关安排，毅然决然“临危受命”肩负起为北大经济系（学院）开设一门必修课程——经济专业英语的重任。

专业英语课是为在高等院校经济专业的学生完成基础阶段英语学习后，培养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阅读有关经济专业书刊而开设的一门前所未有的课程。上世纪80年代初，据悉开设这门新课程的高校仅有三家，除北大外，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和天津南

开大学（后者的任课老师也是我在北京经济英语培训中心的学友）。我自己并非英语专业科班出身，欠缺相关的知识与教学经验，心中不免有些战战兢兢。值得庆幸的是，北大具备教书育人的“天时地利人和”优越条件，使我的专业英语课的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北大是知名学府，其中经济系的“特菜”专业——西方经济学科更是人才济济。开课之初，我得到许多前辈老师的精心指导与无私辅助，特别是造诣颇高的学者教授罗志如先生。我开课的第一年，他每周坚持花两个上午的时间就我备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疑点做课前的答疑解惑，为讲课把关，使我的课堂教学得以逐步做到完善无误。这段“将军扶我上马赴战场”的经历成为我的整个教学生涯中勇往直前的原动力。此外，北大还聚集着众多的外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有的还是中英文兼通者。当备课过程中遇到一些生僻的典故与用语，或需就某语言点做中英文对比分析时，我经常找他们帮助解读清楚，有机会还设法请他们乃至他们的夫人，客串教授口语方面的辅助课程。

经济系（学院）在“硬件”和“软件”方面也十分“给力”，为我开放“绿灯”，予以“特殊政策”，使我得以按需自由公费选购相关书刊和参考书，请人打印各类教材和参考资料，其中还包括分发给学生的教材，放手让我自行编选和使用与北